

出走与回归：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变迁

◎ 朱香玉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后，东正教遭到苏维埃政府的压制。随后在三年的俄国国内战争中，大批保皇派东正教人士随落败的白军逃离海外，并于1920年正式成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最高管理局，由此开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长达八十多年的分裂。而后由于出现了教会管理权与教区自治等问题的分歧，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出现分裂，最终形成以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以巴黎为中心但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西欧主教区和以纽约为中心的北美高级主教区。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得以相对自由地保护和传播东正教传统文化，并且成为俄罗斯移民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境外教会 东正教移民

作者简介：朱香玉，江苏师范大学中俄学院讲师。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受洗，从此基督东正教便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并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精神气概与文化内涵。直到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东正教的历史命运被改写，其活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与冲击。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和 policy，比较重要的有“土地法令”和“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法令。“土地法令”即宣布一切土地，包括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为全民财产，以削弱东正教会在经济上的实力。^①“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则实际上宣告取缔了东正教千百年来作为俄罗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十月革命彻底动摇了主教公会教会^②，完全摧毁和消灭了它的阶级基础和国家基础。随后的10年是它迅速瓦解和没落的时期，^③也是在那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造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长达八十多年的分裂。

一、从临时管理到彻底独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东正教活动的打压激起了教会神职人员对苏维埃政府的不满与反抗。在随后三年的俄国国内战争中，一批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保皇派东正教人士义无反顾地加入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随着苏维埃红军的逐渐胜利，大批保皇派东正教人士随着白卫军一起撤退，之后辗转流亡海外。

1919年5月6日，随白军撤退的保皇派东正教人士在塞瓦斯托波尔召开了南俄罗斯教会大会（Южно-Русский Церковный Собор），并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教会临时最高管理局（Временное 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教会临时最高管理局不受苏联政府的控制，并且远离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实际上这个教会最高管理局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史上第一次独立自治的尝试。起初教会最高临时管理局是由大主教米特罗凡（Митрофан）主

①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138页。

② 主教公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

③ [俄]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85页。

管，后来白军将领弗兰格尔（Врангель）邀请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Антоний）掌管教会最高管理局。随着苏维埃红军的节节逼近，安东尼主教和白军不得不撤离俄罗斯，前往君士坦丁堡，于是教会临时最高管理局的工作暂停。1920 年 11 月，在撤离的船上保皇派东正教人士召开了东正教境外最高管理会议（зарубеж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Высше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在此次会议上明确了境外东正教最高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即管理俄罗斯境外所有俄罗斯东正教移民和军队的教会生活。此次会议召开不久，都主教安东尼就致信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都主教多罗费（Дорофей），希望得到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支持，以此保护境外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的利益。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方面的积极回应。1920 年 12 月 22 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发布第 9084 号公文，其中规定：“为了安抚和鼓舞俄罗斯东正教移民，决定赋予俄罗斯主教符合普世教会要求的执行权力。”^① 即在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的支持下，俄罗斯境外最高管理局可以在隶属于其他牧首区的教规领地内管理俄罗斯东正教移民。随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主教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以此作为境外教会的管理机构，由此拉开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发展历史。位于西欧、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美国等 34 位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参与了此境外教会的成立，并选举了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为境外教会的最高管理者。

其实，境外教会在成立之初并不打算脱离母教会，即莫斯科牧首区，参与境外教会成立的保皇派高级主教也并不反对莫斯科牧首区的管理，他们只是希冀恢复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境外教会在成立之初只是俄罗斯东正教在境外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机构，并且其临时管理权是得到莫斯科牧首区的认可。因为根据 1920 年 11 月 20 日俄罗斯大牧首吉洪（Тихон）所发布的第 362 号文件，其中规定，“如果一教区由于前线战争与最高教会管理局失去联系，或者以牧首为首的最高教会管理局停止了教会活动，那么该教区主教应当立即主动与其邻近的教区主教建立沟通联系，并且可以以建立最高教会临时管理局或者成立都主教区等方式，共同建立一个可管理多教区的临时管理机构”。^② 因此，刚成立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隶属的关系，境外教会只是暂时性的拥有管理境外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的权力，并且希望在此之后可以回归莫斯科牧首区。

1921 年 5 月 12 日，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从伊斯坦布尔迁至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 - 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即后来的南斯拉夫），并得到当地牧首的热烈欢迎。8 月 31 日，塞尔维亚东正教主教公会承认俄罗斯境外东正教在当地的管理权。此外，最高教会管理局的工作也得到了 30 位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认可，包括北美都主教普拉东（Платон）和西欧都主教叶夫洛吉（Евлогий）等。为了巩固境外最高教会管理局的合法地位，境外主教尝试与俄罗斯大牧首吉洪建立联系。1921 年 6 月，都主教安东尼向莫斯科牧首递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安东尼提议，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应当负责管辖莫斯科牧首区在海外的所有教区，即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北非、日本和中国的教区，并且在该地设立牧首代理人（Патриарший наместник），并由其代为管理。然而，此提议遭到了莫斯科牧首区的拒绝。在 10 月 13 日的回信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吉洪、主教公会和最高教会委员会一致认为设立境外牧首代理人是不合理的，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应当只保留最初的管理权限，更不应该将管理范围扩

① Попов А.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л (1920–1934 гг.). <https://ros-vos.net/holy-land/rus-emigrants/Turkey/3/>. (阅读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

② Указ патриарха Тихона № 362.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6102.html>. (阅读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

大到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境外教区。^①因此,境外教会的管理范围实际上得到了限制。

1921年11月21日,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召开了第一届境外东正教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境外教会主管司法、教育、宣教、经济等部门的领导者,并且强调了境外俄罗斯东正教最高管理局是在俄罗斯南方成立的最高俄罗斯教会管理局的合法继承人,是在东正教普世牧首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大牧首的祝福下召开的,也是得到了莫斯科大牧首的承认。^②在此次会议上也再次明确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管理和身份问题,即该教会是归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由于此次会议是在卡尔洛瓦茨召开的,所以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

在此会议上,境外教会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崇尚君主专制,呼吁恢复合法的东正教沙皇重掌俄罗斯,并以此次会议的名义向定于1922年4月召开的热那亚国际会议发出呼吁,要求全世界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此声明一出,立即遭到了苏维埃政府的严厉打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莫斯科牧首区与境外东正教的关系。因为在1919年10月8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吉洪迫于革命政权的压力与威胁,决定不再号召神职人员和教徒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发布公开信,呼吁主教们和神职人员不要参加任何反对政治党派和政治的活动,号召他们应当忠于和服从新生的政权。^③然而境外教会认为,吉洪牧首的这个宣言是在苏维埃政权的胁迫下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因而对此置之不理。但是,境外教会如此大张旗鼓地表达自己敌对的政治立场显然恶化了处于苏维埃政权管理下的俄罗斯境内教会的处境,这也从侧面开始激化俄罗斯境内外教会的矛盾。

卡尔洛瓦茨会议召开后,莫斯科当局立即要求吉洪牧首开除境外主教们的神职。迫于政局的压力和教会生存的挑战,吉洪牧首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否定境外教会的合法地位。1922年5月5日,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圣主教公会和最高教会委员会一致通过第348(349)号法令,决定取缔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此法令言明,境外教会的任何声明和主张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无关,莫斯科牧首区不承认境外教会所发表的政治言论,鉴于其所做所为违背苏维埃政治意愿,决定废除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同时将俄罗斯东正教欧洲教区的管理权依旧交由都主教叶夫洛吉,境外东正教主教需自行对其所作出的政治声明承担责任。^④但是,就在这份法令签署后的第二天,吉洪牧首就因为反对苏维埃政府没收教会财产而遭当局逮捕。在境外,牧首被捕的消息先于第348(349)号法令到来,因此348(349)号法令并没有真正实施。而在吉洪牧首受审期间,以维坚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й)为首的教会革新派^⑤企图夺取牧首神权。境外东正教会极力反对教会革新派,支持吉洪牧首,还呼吁广大东正教教徒为吉洪牧首祈祷。同年9月2日,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取缔了最高教会管理局,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以都主教安东尼为首的主教公会。1923年夏,吉洪牧首被释放。迫于政局的压迫,牧首不得不公开反对境外教会的“反政府”行径。但境外教会认为,吉洪牧首的选择纯粹是为了维

① РПЦЗ: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https://pravoslavie.ru/5701.html>. (阅读时间:2020年11月25日)

② Дея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Всеаглично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Собора, состоявшегося 8–20 ноября (21 ноября – 3 декабря) 1921 года в Сремских Карловцах в Королевстве СХС. Сремские Карловцы, 1922. С. 1.

③ Ломанов А. 乐峰:《俄罗斯东正教与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Указ патриарха Тихона № 348.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25726.html>. (阅读时间:2020年11月27日)

⑤ 教会革新派源于1905年的革新小组“三十二人小组”,其目的在于改变教会生活问题,实现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夺取教会的最高领导权,从根本上改革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主张东正教会应当无条件听从苏维埃政权。

护俄罗斯东正教的整体利益，是为了捍卫整个东正教教会的生存空间。^①可见，在吉洪担任俄罗斯牧首期间，境外教会还是相对支持和理解境内教会的声明。但自 1925 年吉洪牧首去世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直至变成相对敌对的状态。

接替吉洪牧首行使牧首职权的是都主教彼得（Петр）。境外东正教会并没有立即承认彼得的领导地位，原因在于并不清楚其对于境外教会的态度以及他对教会革新派的态度。很快，彼得以拒绝参加革新派会议表明了自己对于教会革新派的反对态度，这也使得境外教会开始默认彼得作为牧首临时代理人的身份。1925 年 10 月，主教彼得被捕，代替他的是都主教谢尔吉（Сергий）。刚开始这位牧首临时代理人与境外教会之间还彼此信任，一直保持沟通往来。但是之后，二者关系急剧恶化，境外教会终止与境内教会的所有联系，其最终结果就是俄罗斯境内外教会的分裂。导火索便是 1927 年 7 月 29 日主教谢尔吉发布的《谢尔吉宣言》。在此份宣言中谢尔吉表示，“首先，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公会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应当立即执行吉洪牧首于 1922 年 5 月 5 日颁布的第 348（349）号法令，即取缔境外教会。另外，境外教会应当立即停止其反政府活动，并提交书面声明，确保在任何社会活动中都承认苏联政府和苏维埃的领导。任何违背政府利益的神职人员都将被驱除出俄罗斯东正教会”。^②针对这份宣言，境外教会很快便做出了回应。在 9 月 5 日召开的主教公会上，境外教会表明，鉴于苏维埃政权对于俄罗斯境内教会的控制与压迫，必须终止与莫斯科牧首区的所有联系。^③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彻底分道扬镳。

二、内部的冲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分裂

除了苏维埃政府对境外教会施加外部压力外，境外教会内部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表现为西欧教区和北美教区对教区自治权的争夺上。除了这方面的因素外，以西欧都主教叶夫洛吉为首的西欧派和以北美都主教普拉东为首的北美派与以安东尼为首的卡尔洛瓦茨派在对待苏联政府的态度上也稍有不同。卡尔洛瓦茨派是坚决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统治，坚决维护沙皇专制。而西欧派和北美派在对待这个问题时则表现的相对柔和，并没有附和卡尔洛瓦茨派企图恢复俄国君主制的想法。而在对待东正教境外主教公会的态度上，叶夫洛吉和普拉东都只承认境外东正教主教公会仅具有社会道德意义，而不具有管理与司法职能。

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 1917 年末在西欧创立的。1920 年 10 月 1 日，安东尼主教以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的名义任命主教叶夫洛吉为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高级主教。次年 1 月 30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颁令任命叶夫洛吉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1924 年 10 月 16 日，在卡尔洛瓦茨召开的主教公会上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讨论了西欧都主教区提出的自治问题。在此次会议上，以 8 票反对、4 票支持的结果否决了西欧都主教区的自治权。^④在 1926 年 6 月召开的境外教会主教公会上，都主教叶夫洛吉和境外东正教会真正走向分裂。叶夫洛吉要求重新审视境外东正教会的管理问题，却遭到主教公会

① Митрополит Антоний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Не надо смущаться. http://dugward.ru/library/mitr_antonyi/Antoniy_ne_nado_smuchatsa.html. (阅读时间：2020 年 11 月 26 日)

② Послание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местоблюстител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Сергия (Страгород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и нем Патриаршего Священного Синода («Деклараци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Сергия). 1927 г. <https://www.sedmitza.ru/lib/text/440043/>. (阅读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③ Маковецкий А.В. Белая Церковь вдали от ате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Зарубежной Церкв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итер, 2009. С. 52.

④ Цыпин Владисла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917–1990 гг. М.: ИД Хроника, 1994. С. 211.

的否决，他愤然离席。1927年，都主教叶夫洛吉致信给俄罗斯东正教代理牧首谢尔吉，向其陈述自己与境外教会主教公会的分歧。叶夫洛吉认为，境外主教公会企图掌管俄罗斯东正教在境外的所有教区，试图争取和莫斯科牧首区平等的地位，也就是享有同地方自主教会等同的完整性权力。但是在叶夫洛吉看来，莫斯科牧首区才是境外教会的最高管理者，任何境外教区都应该毫无条件地听从俄罗斯境内教会的管理。^① 他的这封信件赢得了莫斯科牧首区的好感。但是，境外教会主教公会宣布禁止叶夫洛吉继续参与境外教会的所有宗教事宜，并决定废除其掌管西欧高级主教区的权力。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出现分裂，掌管西欧教区的都主教叶夫洛吉宣布不再隶属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而转投向了莫斯科牧首区。

虽然暂时赢得了莫斯科牧首区的认同，但是1930年因参与为十月革命中死难的东正教教徒祈祷活动，叶夫洛吉主教又遭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撤职。而后西欧教区的管理交到了主教叶列夫费里（Елевферий）的手中。叶夫洛吉拒绝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安排，便转投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西欧的临时督主教（Временный Экзарх）。然而，并不是所有生活在西欧教区的俄罗斯侨民都同意接受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例如20世纪杰出的东正教神学家尼·洛斯基坚决反对叶夫洛吉的做法。强烈的爱国情怀使洛斯基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所有教区都应当回归母教会，即俄罗斯东正教会。1932年以后，叶夫洛吉领导的西欧主教区与俄罗斯境外东正教的关系再次恶化。原因在于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一直谴责共济会和基督教青年联盟，并排斥与其建立联系，而叶夫洛吉却接受了来自基督教青年联盟大量的物质帮助，这违背境外教会的主张，双方在长时间里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俄罗斯东正教会派都主教尼古拉（Николай）前往巴黎，与都主教叶夫洛吉和主教谢拉菲姆（Серафим）商讨回归莫斯科牧首区等事宜。谈判进行的很顺利，在取得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同意的前提下，西欧俄罗斯高级主教区成功回归母教会，叶夫洛吉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西欧高级主教区督主教。1946年叶夫洛吉去世，继任者是主教谢拉菲姆。他虽然掌管着西欧教区，但是在主张上却属于卡尔洛瓦茨派教徒，所以这项任命遭到了叶夫洛吉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在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主教的带领下，属于叶夫洛吉派的西欧俄罗斯高级主教区又再次转投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弗拉基米尔主教由此也被提升为都主教。从此，亲叶夫洛吉派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与境内外教会再无关系。现在，这个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瑞典、挪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并且教堂祈祷用语使用斯拉夫语。^② 而继续追随都主教谢拉菲姆的教区在教规管理上依旧归莫斯科牧首区，包括布鲁塞尔教区、苏黎世教区、海牙教区、科尔孙教区和苏洛教区。^③ 1989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公会宣布废除俄罗斯东正教西欧督主教区，并将其纳入教会对外联系部管理。

如果说西欧高级主教区的脱离是由于教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纷争的结果，那么北美高级主教区的脱离则更多的是都主教普拉东个人争取权力独立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北美教区是俄罗斯东正教唯一设立在境外的教区。国内战争爆发后，随着俄罗斯东正教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多，北美东正教教区开始考虑东正教移民的宗教管理问题，便开始

①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местоблюстител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Сергея (Страгородского) и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Евлогия (Георгиевского), управляюще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ыми Русскими Церквями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1927–1928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Отдела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Церковь и время. 1988. № 2(5). С. 85–86.

②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ия русских церквей. <http://drevo.pravbeseda.ru/index>. (阅读时间: 2020年11月27日)

③ Цыпин Владисла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917–1990 гг. М.: Изд. дом “Хроника”, 1994. С. 220.

加强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自 1922—1926 年，北美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隶属于境外教会的管理。1922 年，牧首吉洪任命普拉东为该教区都主教，他本人也表示将服从境外教会的管理。但是，1924 年吉洪牧首突然解除普拉东的宗教职务，并要将其遣送回国。普拉东本人是极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且在内战期间，曾经作为奥德萨都主教的普拉东甚至组织过军队来反抗苏维埃红军。意识到回国将受到苏维埃政府的无情压迫，普拉东选择拒不服从，并打算带领北美教区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而后在底特律召开了由神职人员和信徒均参与的北美教区会议。同时，为了让外界相信北美教区的独立不是普拉东本人操作的结果，普拉东本人并未参与到此次大会。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俄罗斯东正教北美高级主教区变为美洲俄罗斯东正教临时自治教会，脱离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成为自主管理教会，普拉东本人为美洲东正教临时自治教会的领导。在 1926 年召开的俄罗斯境外教会主教公会上，普拉东和北美教区的自治倾向遭到与会神职人员的强烈谴责。于是 1927 年，北美高级主教区宣布正式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建立美洲独立教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因为战争的爆发和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北美教会曾几度回归俄罗斯东正教会，但是又由于对苏联管理体制的不满，最终于 1970 年宣布彻底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成立世界上 15 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并得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正式承认。自此，20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事实上已经分裂为以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以巴黎为中心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西欧主教区和以纽约为中心的独立的美国东正教会。

三、存在的价值：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作用

境外教会的成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但是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思想家和教会神职人员并没有中断对俄罗斯东正教及俄罗斯思想的研究。相反，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得以相对自由地保护和传播东正教传统文化。

首先，境外教会是俄罗斯侨民的精神寄托与信仰支柱。千百年来存在着的东正教及其精神已经深深浸入俄罗斯民族的血脉，在联系民族感情、维护国家团结统一方面始终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因为政治见解的不同而被迫流亡海外，但是东正教文化孕育出的俄罗斯精神却没有泯灭。“俄罗斯移民……面临着分散，丧失民族特性，与祖国、大地和人民失去联系的威胁……但是俄罗斯精神可以使我们团结，这种精神应当在俄罗斯东正教中寻找。只有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俄罗斯移民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只有在宗教活动中，境内外的俄罗斯人民才能组成真正统一的精神有机体。”^① 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移民来说，不仅是境外流离生活中精神的寄托，也具有团结境内外俄罗斯人民的功能。东正教信仰和教会生活可以使饱受流离之苦的俄罗斯侨民坚定爱国主义信念，所以他们将在国外的逗留仅视为一种暂时的、被迫的现象。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侨民中的大多数人都拒绝接受其所在国家的公民身份，虽然这有时会导致当局的迫害和遭到分裂主义的指控。在 1956 年召开的主教公会上，境外教会再次明确自己的地位，“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只是采取临时自治的形式”。^② 但是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让境外教会始终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间接地预兆着在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国家奉行的

① Духовные задачи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Путь. 1925. № 1// Путь. Орган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мысли. Изда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в Париже. Кн. I (I-VI). М., 1992. С. 4.

② Положение о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Заграницей. <http://russianorthodoxchurch.ws/synod/documents/polozenierocor.html>. (阅读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

宗教自由政策和对宗教采取尊重、借重的态度必然会促进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的统一。

在俄罗斯侨民的共同努力下，境外东正教宗教生活也没有中断。除了举行正常的教会仪式外，他们还恪守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墓地习俗，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甚至开展东正教封圣活动。圣徒崇拜始终是东正教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苏维埃政府对东正教活动的压制，俄罗斯境内东正教的封圣活动一度停止，然而境外东正教会的封圣活动却未中断。最典型的就是1981年11月1日，境外教会率先将吉洪牧首封为俄罗斯新殉难者和忏悔者。

其次，境外教会是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中心。因为俄罗斯境内的东正教活动受到破坏，这阻碍了境内东正教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境外教会却将东正教文化发扬光大。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俄罗斯精英阶层流亡到国外。在巴黎就聚集着俄罗斯三分之一的移民^①，包括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什梅廖夫、鲍·扎伊采夫、阿·库普林、伊·布宁、康·巴利蒙特、玛·茨韦塔耶娃等，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彼·司徒卢威、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格·费多托夫等，他们的存在使巴黎成为俄罗斯移民的文化和宗教中心。

苏联时期，俄罗斯境内东正教会几乎关闭了所有的神学院，神学的发展戛然而止。而俄罗斯东正教侨民却在巴黎创办圣谢尔吉神学院，吸引了诸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前来任教，因此这所学院后来成为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思想家活动的中心。在这里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例如大祭司弗洛罗夫斯基、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洛斯基、弗拉基米尔·伊林等。在当时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西欧派，即叶夫洛吉派是俄罗斯20世纪东正教文化的主要载体。二战后，一批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如弗洛罗夫斯基、洛斯基和梅延多夫从西欧前往美国，并且在美国创办了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开启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美国学派。^②除了上述两所神学院的创办，俄罗斯东正教侨民还在1923年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拉多米罗夫建造了圣约夫修道院，1930年在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创建圣三一修道院，1948年在圣三一修道院又建立圣三一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后来也成为俄罗斯境外东正教的精神文化中心之一。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始终保留着东正教的虔诚传统，在境外积极从事出版和教育事业。如出版了大司祭谢拉菲姆的《上帝的律法》，大主教阿维尔基的《四福音注释》和《使徒注释》，大神甫米哈伊尔的《教义神学》等。除了出版这些神学书目外，境外俄罗斯东正教还在各地创办诸多东正教杂志。例如，在斯洛伐克创办了《东正教罗斯》报刊，在贝尔格莱德创办的杂志《教会生活》和《教会评论》，在巴黎创办的《俄罗斯基督教运动公报》和俄罗斯宗教哲学和历史出版物《道路》，在美国创办的《俄罗斯复兴》等。^③这些报刊的创办都真实地记录了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的宗教生活、境外教会的发展动态和宗教神学的发展，并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了解境外教会移民的一手资料。除此之外，境外教会的发展也促进了20世界俄罗斯宗教文学的复兴，这就包括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耶夫、霍米亚科夫等人作品的再版和广泛传播。以弗拉基米尔·里亚布申斯基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艺术家还在巴黎创办了圣象画协会，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俄罗斯的宗教建筑和艺术。

另外，境外教会也是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教中心。生活在西欧地区的俄罗斯移民、

① Раев М.И. Росс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М: Прогресс-Академия, 1994, С. 261.

② Поспеловские Д. В. Роль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в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https://www.pravmir.ru/rol-russkogo-zarubezha-v-rasprostranении-pravoslaviya/>. (阅读时间: 2020年11月27日)

③ Шкаровский М.В.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овн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XX веке: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чтение, 1 (42), 2012 года.

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道路》中写道，“东正教具有普世意义……它应当成为全世界精神的力量”。^① 伊·布宁也认为，俄罗斯移民首要的任务就在于保存俄罗斯的精神文化和维持宗教生活，并努力将其发扬光大。^② 俄罗斯东正教移民虽然身处异乡，但并没有中断自身的传教使命，时刻不忘弘扬俄罗斯东正教思想，甚至对西方的天主教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扩展到境外地区。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只在北美的阿拉斯加设立了一个主教区，其余则隶属于俄罗斯境内相应的主教区。十月革命后，莫斯科牧首区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反宗教政策并没有开展实际意义上的传教活动，^③ 而境外教会则成为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教中心。当时的北美都主教区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进行传教，西欧教区主要在法国和英国，并形成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东正教团体。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主要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活动，甚至在一些非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建立了东正教教堂，并且由俄罗斯人担任主教。巴黎圣谢尔吉神学院的成功创办吸引了不少俄罗斯东正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在此教授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和哲学，撰写书籍，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力。难怪尼·泽尔诺夫教授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黎神学院逐渐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最重要的科学和精神中心，也成为连接东方东正教会和西方天主教会最重要的结点。”^④

四、结语

2007年5月1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东正教圣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里，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隆重签署了《关于教规共融的协议》。至此，分离了80余年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实现了统一。目前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已经统一十余年，双方在教会事务上都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共同进退。2017年，俄罗斯都主教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在教会统一十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十年共同的教会生活表明，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们充分感觉到自己是同一个教会的成员……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拥有一个统一的教会，我们共同举行教会仪式，共同为教会服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⑤ 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说，境外教会的回归是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会共同努力的成果，是民心所向与大势所趋。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境外教会的回归也带来了侨民文化的回归，这让苏联时期流亡在外的东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得以在俄罗斯本土传播与发扬光大，从而促进了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发展。总之，境外教会的“出走”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因素导致的，它不是永久性的分裂，而只是迫于形势所做出的临时性抉择。境外教会的回归结束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分离80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俄罗斯东正教史上极具重要性的成果。

（责任编辑 王伟）

-
- ① Духовные задачи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Путь. 1925. № 1// Путь. Орган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мысли. Изда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в Париже. Кн. I (I-VI). М., 1992. С. 5.
- ② Там же.
- ③ Священник Дионисий Поздняев. К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орее (1917-1949) //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орее. М., 1999. С. 352-359.
- ④ Зернов Н.М. Русск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XX века/ Пер. с англ. 2-е изд., испр. Париж: ИМКА-Пресс, 1991. С. 241.
- ⑤ Единство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о: К 10-летию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и Русской Зарубежной Церкви. <http://biblsinod.ru/index.php/фонды/13-новости/81-единство-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о>. (阅读时间: 2020年11月29日)